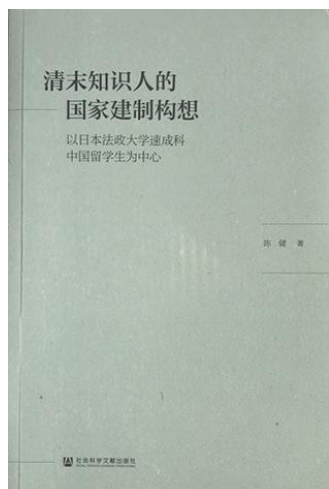


陈健：《清末知识人的国家建制构想》摘要



书名：《清末知识人的国家建制构想》

副标题：以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中国留学生为中心

作者：陈健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2020-11

页数：312

定价：118

装帧：平装

ISBN：9787520176804

内容摘要：

20世纪初，在经历了戊戌变法的失败后，知识精英爱国救国的热潮并未退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日本，继续着君主立宪的宣传和活动。但是变法的失败带给了他们惨痛的教训，开始思考，若要改革有成，必须从根本上着手，即要改革政体，建立议会制度；而另一部分人，则对统治阶层失去了信心，认为体制内的改革已经无济于事，唯有彻底推翻现状，建立民主政治才是国家前进的正途。于是，两派知识分子日见分殊，势同水火，持立宪主张者，态度较为温和，主张革命者则十分激烈，前者称为立宪派，后者称为革命党。两派站在各自立场，就各自理念展开了论战。然而，辛亥革命的发生，与立宪派又有着非常之关系，武昌起义之后，立宪派亦同时卷入，对革命有着举足轻重之影响。^①

这两种政治思潮和运动在留日学生中亦有着明显的反映。就速成科留学生而言，在思想与政治倾向上，亦是泾渭分明：有站在体制内立场采取温和态度主张君主立宪者，亦有站在体制外立场采取激烈态度主张根本推翻政府实行民主立宪者。但就数量而言，立足于体制内寻找出路，归国后为政府效力的毕业生占了绝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自序，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页。

大部分比重。这与速成科生源的选拔、来源及出身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从学生录取方式看,官费生的派遣占了绝大的比重,自费生则占少数。法政速成科的创办,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因应政府“新政”而设,速成科的入学资格设置亦非常明了:“一是清国在官者及候补官员,二是清国地方之士绅及年龄已满二十岁之有志者,但汉文均须学有根底者”^①,从中可见,速成科设置的初衷是为政府培养改革急需的法政人才。此后大部分毕业生在归国后也确是到了政府的各级部门任职。他们是宪政编查馆的中坚,在草拟筹备立宪的法规时承担了基础性的工作,是中央资政院的主角和地方咨议局的活跃分子,并在发起组织国会请愿运动中发挥了重要推动力量。^②关于官费生的派遣情况,我们可以从以下事实中略见一斑:前文在论述速成科创办历史时曾提及,梅谦次郎与杨枢相商速成科创办事宜后,杨枢便答应分咨各省大臣着力选派。就在当年9月,袁世凯率先遴选官绅50人送入速成科第二班学习^③;同一时期,广东省亦公开招选,最后50余名官绅亦进入第二班;河南巡抚陈夔龙为支持学生前往,“饬司道于款绌万难之中,觅筹经费”^④,以为游学之用;浙江巡抚聂辑规也积极配合,最后选定官、绅各10名,每名给银六百元,一体送入速成科学习^⑤。这种由各级政府着力选拔、寄予期望并在将来委以重任的官派方式显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府对人才的控制和使用。而投身革命者,毕竟在官费生中比例较小。

其次,就速成科学生地域来源情况看,两湖、江浙、直隶等成了留学生的主要来源地。翟海涛的博士论文中作了专门统计,在速成科的毕业生名录中,共有1142人,除去籍贯不详和统计重复者,剩余的1088名毕业生籍贯分布情况见下表^⑥: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省份	人数
湖北	170	四川	82	广西	40	江西	13
湖南	156	广东	77	贵州	28	云南	10
江苏	121	福建	67	山西	17	陕西	5
浙江	90	安徽	50	奉天	17	甘肃	5
直隶	83	山东	42	河南	14	盛京	1

① 法政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第12页。

② 尚小明的研究考察了留日学生与清末筹备立宪的关系,指出了留日学生在此中所起重要作用,而在这些留日学生中,又有相当一部分是毕业于法政速成科者。如宪政编查馆成立后,在张之洞、袁世凯的举荐下,杨度(第二班学生)首先被调入,并以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行走,不久又被任命为该馆总核。此后又有恩华、张启后、林鹤翔、刘春霖、刘泽熙、许同莘、张则川、李景铄、张鸿藻、蒲殿俊10人进入该馆,分别担任编制局、统计局及候补调用等职。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中亦活跃着速成科毕业生的身影。

③ 袁世凯:《游学日本法政速成科毕业各官不论班次尽先请补片》,《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469页。

④ 《河南巡抚陈夔龙属游学日本文》,《教育杂志》1905年第12期。

⑤ 《本国学事》,《教育世界》,1904年第9期。

⑥ 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3月,第70页。

资料来源：《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第 137-159 页。

从上表可见，留学生派遣规模较大的地区集中在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直隶等地，这得益于上述各省之风气开化、主政者之开明以及有较为富裕的财力支撑甚多。具体而言，两湖、江浙及直隶之成为速成科学生的主要来源地，这与晚清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后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端方、周馥、袁世凯等人在上述各地的主政及积极谋求体制内的变革有绝大关联，这些地方也是在清末新政中表现较为积极、成绩突出的地域，因而留学生的派遣与任用都卓见成效。尽管各地留学生派遣规模不同，但速成科的毕业生思维活跃、见识广博，普遍热衷于讨论政治问题、投身政治活动，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回国后更广泛、积极地参与到清末政治改革中，甚至担任着主导的角色。如在“预备立宪”时，政府成立宪政编查馆，着手翻译、吸收各国立宪制度及法律，先后进入该馆的速成科学生就有 11 位，其中第二班的湖南籍学生杨度在张之洞、袁世凯的举荐下，首先被调入，并以四品京堂任宪政编查馆行走，不久又被任命为该馆总核。此后又有恩华、张启后、林鹄翔、刘春霖、刘泽熙、许同莘、张则川、李景铄、张鸿藻、蒲殿俊 10 人进入该馆，分别进入编制局、统计局，或担任候补调用等职。^①另如在“立宪运动”中，直隶省的正副议长阎凤阁（第二班）、谷芝瑞（补修科）、湖北省的正副议长汤化龙（第四班）、张国溶（第五班法律部）、浙江省的两位副议长陈时夏（第二班）、沈钧儒（第四班）都是推动立宪运动的重要人物。其它各省中担任正副议长及议员的速成科毕业生亦不在少数，如江西副议长叶先圻；河南正副议长杜严、方贞；山西议长梁善济；四川正副议长蒲殿俊、潇湘；广东秘书长古应芬、广西正副议长唐尚光、甘德蕃等。

第三，从留学前所受教育来看，多是已有科举出身者。这批留学生很多都是传统教育体系培养出来具有品第官阶的候补官僚、仕学馆学员以及科举出身的进士、举人、生员等^②，大多抱着学有所成、归国效力的初衷而远赴东洋。吴玉章在回顾当年留日大潮时便指出，1904 年在开封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试的举人，无论考上与否，鉴于国内没有出路，差不多都到日本入读法政大学，因此法政大学的学生大都是“上层官僚的弟子”^③。从另一份数据中，更可彰显速成科留学生的出身情况。贺跃夫查证了 185 名毕业生的身份，详见下表：

进士	举人	贡生	生员	学堂出身	不明	合计
115	21	9	9	28	28	185

① 参见《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尚小明：《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6-8 页。

② 这些具有传统功名的留学生中亦有多名状元在列。如戊戌科状元夏同和（1869-1925，第一班）、乙未科状元骆成驥（1865-1926，第五班政治科）、甲辰科的刘春霖（1872-1944 年）。此外，尚有甲辰科的榜眼朱汝珍和探花商衍鎤。

③ 吴玉章：《辛亥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年，第 62 页。

从此表可以约略看出，具有传统功名者在留学生中占了一定的比重。此表所列 185 人的出身情况，或许只能代表速成科一小部分，但至少反映出一点，即这个时期政府官费派遣的留学生很多是有着“正途”出身的，获得了政府积极广泛的支持和鼓励，而不再像过去派往欧美者，多是民间招募，无法获得广泛的出身认同。即如这 185 名留学生中，即包括了进士馆 95 名进士，1906 年清政府将这批进士一并送入法政大学，其中 37 人进入补修科，58 人进入速成科第五班。^①进士馆是传统社会政府培养精英人才的地方，除去科举废除后传统科举名士的出路受阻而不得已的因素外，如此大规模地派遣留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时势与观念的变化，政府对待留学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此外，从这批留学生归国后参加考试选拔以获重用来看，更可说明此点。从 1908 年起，清政府先后举行过多次留学生毕业及录用考试，不少速成科毕业生由此脱颖而出。如在 1908 年的留学毕业考试中，曾毕业于法政速成科第二班的程树德被给予法政科进士，朱孔文、吴宪仁、王恩博、王家駒、金庆章、郑浩、何福麟、樊树勳、区枢、胡国洸、朱绍濂、陈官桃、陈高第等 13 人则被给予法政科举人；1909 年的留学毕业生考试进士及第者有单毓华、祁耀川、郭经、凌士钧 4 人，中举人的有冯国鑫、孙润家、狄梁孙、陈天辅、邱心荣、周祚章、刘重熙、吴荣炳、林觀光、吴天宠、蹇先榘、崔斯哲、区諲、张伯侦、叶衍华、陈光、姚生范、李谠等 18 人；1910 年的考试中则有江古怀中进士，中法政科举人的有林祖绳、郭秀如、董森、陈文中、尹耕莘、柴宗溶、黄翼、熊彦、吴铎、张炳星、陈鸿慈、吴懿、郭襄臣、陈国镛、黄中恺、刘大魁、凌肇伦、钟铎、余若瑜、李维翰、黄睿、何宗瀚、陈襄廷、杨拱、钱崇固、滕骥、孙德震、钟宝华、沈秉诚、赵家璧、欧阳景东、李惠人、洪荣圻、关和钧、曹广涵等 35 人；在 1911 年清政府举行的最后一次留学生考试中亦有陈焯侯、叶开琼、李碧、保廷樑、郭则缙、张鼎勳、吴肇嘉、高奋、张树森、叶毓崙、谭毅公、杨宗彩、王承楫、范镛、范文源、邱廷举、周锵鸣、吴哲等 18 人得授法政科举人。在上述人员中，除最后一次留学生考试得中者因清廷覆亡未及录用外，其余人员全部被清政府吸纳入体制内，成为中央各部官员或地方知县。^②

与速成科毕业生大部分投身“体制内改革”形成对比的，是另部分主张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主立宪制度的革命党。他们在速成科学生中数量有限，但影响深远。他们多是年纪较轻、受过新式学堂教育者；他们思想奔放、激进，宣传鼓动能力亦更为突出；他们通过成立革命团体、广结联盟、发行报刊等方式积极地为革命造势，传播革命理论、为革命的到来摇旗呐喊；待到革命爆发，他们

^① 法政大学史资料委员会编《法政大学史资料集第十一集》，第 148 页。

^② 《本国学事》，《教育世界》，1904 年第 9 期。转引自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以日本法政速成科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 3 月，第 211 页。

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实际的军事战斗中，谱写了近代史上救亡图存、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首先，就积极筹建革命团体而言，速成科学生是主要的发起人和参与者。在清末反清革命洪流中，先后涌现了诸多的革命团体，如华兴会、革命同志会、同盟会、共进会等，速成科学生在这些团体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详见下表所列：

名称	成立时间	地点	参与人
华兴会	1903	长沙	宋教仁、陈天华、陈嘉会、杨德邻
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	1902	东京	王家驹（主要发起人）
湘西学会	1904	东京	宋教仁
革命同志会	1904	东京	宋教仁
新华会	1904	东京	仇鳌、罗杰
黄汉会	1904	长沙	陈天华
演说练习会	1905	东京	宋教仁
同盟会	1905	东京	宋教仁、汪兆铭、朱执信、陈天华、李文范、张树柟、古应芬、金章、杜之杖、姚礼修、张树棠、居正
自治学社	1906	广东	叶夏生
共进会	1909	东京	居正（主要发起人）、张竞知（主要发起人）、谭毅公（主要发起人）、张知本

资料来源：张玉法著：《清末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510页。

其次，就革命理论的宣传鼓动而言，速成科留学生亦是革命阵营的得力干将。以同盟会创立的机关报《民报》为例，主要撰稿人中速成科学生占有相当分量。尤其在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展开激烈论战的前20期，速成科学生汪精卫、陈天华、胡汉民、朱执信、宋教仁撰写了大量有关民族、国家、国民、国法（宪法）、国际法、经济学、财政学等方面内容的文章，系统应用了他们经由速成科所接受的西方最新的法政知识和理论。^①

再次，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很多速成科学生积极组织武装起义，并担任指挥。广东籍法政速成科学生，他们当中加入同盟会者众多，朱执信、古应芬、叶夏生、李文范等人在归国后纷纷进入广东法政学堂任教，在学堂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暗中发展革命力量；宋教仁在1907年2月亲赴辽东联络会党，并组建了同盟会

^① 《民报》主要撰稿人所写文章具体的统计，参见朱渊源：《同盟会的革命理论——〈民报〉个案研究》附表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专刊（50），1985年，第339页。

辽东支部；更可歌可泣的是，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汪精卫等人懊丧之下，谋划刺杀清摄政王载礼以振士气，然不幸失败被擒，深陷囹圄。

正是在年轻的革命派可歌可泣的爱国事迹感召下，加之对清廷政治改革的绝望，立宪派对于时局和民心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转而支持革命，共同为推翻满清、结束帝制而努力，于是，原本政见不同的速成科学生群体出现了合流的趋势。武昌起义爆发后，同盟会主要成员均不在第一线，于是很多地方实力派的政治倾向成为影响革命发展的重要因素。恰在此关节，同为速成科毕业的很多地方立宪派首领转而支持革命，并形成响应之势，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如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在革命爆发后被推为首领，在致各省咨议局的电文中称：“维新绝望，大陆将沉，……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①。汤化龙态度的转变对各省咨议局影响甚巨，正如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所谓：“因为汤化龙以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十四省才相继响应。”^② 民国建立后，很多立宪派首领和成员亦都成为新政府各级官员。如四川的蒲殿俊担任了都督之职；湖北的张知本担任了司法司长；浙江的沈钧儒担任了教育司长等。

就速成科毕业生而言，革命与立宪这两派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最终能够在革命之势山雨欲来之际摒弃前嫌、共同为民国的建立而奔走奋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有着共同的教育背景。尤其从速成科具体的教育内容来看，西方民主宪政体制的国家形态是他们共同认同和接受并欲在中国实现的理想。然而，所谓“民主宪政体制”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从国体角度看，有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之别，从具体国家来看，君主立宪在英、德、日，民主立宪在法国和美国，其具体运作又都有很大的不同。立宪派与革命派最初的理念分殊是在于对实现政治理想具体道路选择的不同，而皇族内阁成立，立宪派彻底失望之余，也即体制内的君主立宪道路的破产，此派知识分子转而趋向另一条道路的尝试，并与革命派合流共同成为民国肇立的政治基础，便是情理之中的选择。

作者简介

陈健，1980年生，山东泗水县人，历史学博士，现为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他各级各类研究项目3项，先后在《史学月刊》《史林》《历史档案》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① 张国淦等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101页。

^②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20页。